

1001.3

河北文史资料

- 直隶辛亥革命概述
- 陈毅谪居石家庄
- 石家庄市改造妓女禁烟戒赌实录
- 打狼英雄俞昌
- 旧北京烟害亲历记

在这金风送爽的季节，我们将本刊第3期奉献给广大读者，愿它在喜庆丰收之时给您增添一点喜悦。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80周年，本期特增设纪念专栏，发表一组有关河北（直隶）辛亥革命的史料，以资纪念，并以此表达对革命先行者们的敬仰和缅怀。为使读者对当时直隶辛亥革命的情况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本刊编辑部特撰写了《直隶辛亥革命概述》一文。过去几年中，本刊曾陆续发表过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这次则选发几篇未刊稿，以飨读者。

在《共和国足迹》栏目中，编发了3篇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河北各地根除烟、赌、娼等社会公害的史料，对于今天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有重要借鉴作用。《人物春秋》栏目中，首次披露了陈毅元帅“文革”期间在石家庄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处逆境，仍然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密切联系群众的高尚情操。焦实斋先生一生坎坷，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他的人生轨迹，展示了中国旧知识分子风貌。对美国友人韩丁先生的回忆，再现了韩丁先生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打狼英雄俞昌则向读者介绍一个传奇人物，他为民除害的执着追求令人佩服，读来饶有兴味。

《工商史综》、《艺术园地》、《燕赵采风》等栏目，则反映了河北近现代的经济、文化、社会风尚的不同侧面。《旧时黑幕》中的两篇短文，旨在使读者了解旧社会的烟害对中华民族危害到了何种程度。

编

者

絮

语



河北文史资料

目录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直隶辛亥革命概述	本刊编辑部	1
直隶咨议局与立宪运动	张大军	19
辛亥革命前后直隶的社会风尚		
	徐永志 吕炳丽	32
辛亥革命烈士王虎臣	李胜田 殷英才	42
先父丁东第辛亥事略	丁洪伦	46
不世之功 谁人评说	唐向荣	49

●共和国足迹

石家庄市改造妓女、禁烟、戒赌实录		
	吴景仁 张克勤	57
热河戒烟录	田果如	64
张家口市肃毒禁烟纪实	李兆俭	70

●人物春秋

陈毅谪居石家庄	张建华	76
焦实斋生平事略	高录堂	86
忆美国友人韩丁先生	徐文英	95
打狼英雄俞昌	张卫 邵秉林	105

●工商史踪

“保记号”十年历程	陈国璋	119
-----------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办
总编：李秉新 副总编：徐俊元 石玉新

解放初期的秦皇岛海关	李桂林	128
张家口皮毛栈	赵嘉林	135
我的学徒生活	张连云	140

●艺术天地

英年早逝的表演艺术家张淑敏

	李桂岭	张梦亭	148
歌剧《白毛女》在张家口	舒强		158
尚小云在故乡演出纪实	王庆朝		160

●旧时黑幕

旧北京烟害亲历记	陶广仁	164
围场县阿片种植及其危害	杨振国	173

●燕赵采风

香河风俗习惯	王柏山	尹玉如	178
坝上婚俗琐谈		赵占荣	189

●补白 苏三坟墓的变迁 (69页) 30年代的河北体育 (163页)

●稿约	48
-----	----

●更正	177
-----	-----

责任编辑: 杨小波 谢凤英 武永召

封面设计: 宋丕胜

直隶辛亥革命概述

● 本刊编辑部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它以巨大的历史推动力，推翻了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在我国近代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直隶是当时清廷的京畿要地，处于“天子脚下”，其地位极其重要，向来为清廷所严密控制。但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直隶的革命志士和人民为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在这里掀起了革命斗争风暴，象插入清朝统治心脏的匕首，给予封建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辛亥革命前夜的直隶

清朝末年，反动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为挽救其摇摇欲坠、濒临灭亡的命运，对外卑躬屈

膝，妥协投降，对内则加紧横征暴敛，严酷压迫。直隶地处京畿，为中外反动势力所盘踞，是清朝统治最为严密之地。因此，直隶人民所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的蹂躏和压迫也较他省为重，故不断掀起反抗斗争，社会处于严重动荡不安之中。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各种革命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在这里逐渐兴起，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统治的宝座。

由于直隶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因此自从《辛丑条约》签订后，直隶人民受到比以往更为严重的盘剥。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为偿还“洋债”和举办“新政”，将分摊到直隶省约3610万余两的巨额款项，全部以捐税名义摊派到直隶人民的头上。为此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残酷手段，除对原有的田赋、厘金、盐税等旧税成倍加征外，新的苛捐杂税剧增，名目不胜枚举，以至“无物不捐，捐上加捐”，甚至添丁进口、婚丧嫁娶亦要上税。致使纳税人前往交税，竟成“挨次站立，摩肩靠股”之状。更有贪官污吏借机搜括民财，中饱私囊，使人民的负担更为沉重，不堪忍受，不得不铤而走险。正如当时天津一家报纸所言：“政府就是明火大头目，督抚司道就是明火二头目，府厅州县就是明火小头目，……小民没有别的办法，除去聚众造反，就是坐着等死了。”据不完全统计，直隶人民反洋教与反苛政的斗争从1901年至1910年多达百次。在广大农村，农民们或是痛殴驱赶税官，或是成群结队冲进城里砸毁县署教堂，赶走县吏，少则百人，多则数千上万人。其中尤以1902年广宗县武举景廷宾和巨鹿县农民赵洛珠领导的反抗教案赔款起义规模最巨。他们高举“扫清灭洋”、“官逼民反”的旗帜，啸集三四万人马，袭击清军，捣毁教堂，活动遍及直隶南部24州县，声威直震近畿，迫使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免去广宗等州县的教案赔款。1905年，天津塘沽渔民，因不堪忍受腹削刻剥的捐税，亦聚众暴动，进行反抗。1907年8月，愤怒的南官县农民将知县痛打致死。1910年，良乡、涿县农民以“杀尽贪官污吏”为口号揭竿而起。凡此种种，表明了素有反帝

反封建传统的燕赵人民,对已成了“洋人朝廷”的清朝统治者极端愤恨,不断起而反抗,使清朝统治的根基早已处于动摇之中。

在直隶民变激生的同时,直隶民族资产阶级也在艰难中崛起,向清王朝展开了争取经济权力和政治地位的斗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隶近代工业得到一定发展,相继办起了开平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井陉煤矿、临城煤矿等大型工矿企业,同时中小型企业亦纷纷出现。1903年直隶工艺局成立,进一步掀起了兴办厂矿的高潮。但是直隶的民族资本主义自始便面临着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侵吞和封建势力的挤压,举步维艰,发展迟缓。1902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昏愦,英国墨林公司将利润丰厚的开平煤矿骗占。与此同时,洋货也以其物美价廉大量涌入,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市场,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形成严重威胁,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起而抗争。1905年以反对清廷与美国续订《华工禁约》为导火线,全国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的高潮。直隶民族资产阶级亦积极投入其中,商界学界一致行动,向民众揭露美国迫害华工的罪行,激发爱国热情,号召商店不卖美货,民众不买美货,码头工人不卸美货,以致美货大量积压,损失颇巨。同时大力宣传提倡使用国货,设法提高产品质量,以与洋货抗衡,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抵制美货运动在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同时,对于传播反帝爱国思想,唤起民众救国救亡意识的觉醒,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后,直隶民族资产阶级为进一步求得生存和发展,争取合法的政治地位,又掀起了立宪运动的高潮。

1905年,清廷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极为恐慌,为消弭革命,分化欺骗资产阶级,宣布了“预备立宪”,而后又于1908年宣布预备立宪期为9年,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政局。这使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人士继续对清廷抱有幻想,希图以和平的方式达到变革政治,救亡图存的目的。他们以请愿的方式向清廷要求提前召开国会,速行宪法。1907年,直隶士绅由清末状元刘春霖领衔,向清廷递交了请愿书。1909年顺直咨议局

成立后，资产阶级立宪派便以此为阵地，进行激扬舆论，扩大政治影响，组织请愿活动，将立宪运动推向高潮。1910年，顺直咨议局联合各省咨议局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直隶省请愿代表团以立宪派中坚人物、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联合绅商学界，连续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一再上书清廷提前召开国会，直隶各阶层及报界也给予大力支持和响应。但是请愿所得的结果，却仅仅是清廷将9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至5年的虚假允诺。这使得立宪派大失所望，深感“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对立宪的前途发生了怀疑。年底，由天津学界和东北请愿团联合发起的第四次请愿活动遭到了直隶当局的镇压，领导人温世霖被拘捕，发配新疆。不久，清廷即成立“皇族内阁”，暴露其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继续维持封建专制统治的真面目。请愿活动的失败，使部分资产阶级立宪派认识到清廷的愚顽不冥，要求立宪此路不通，唯有诉诸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中国才有希望，遂向革命派转化靠拢。顺直咨议局即于此时确定了要“推倒现政府”的斗争方针。

在清朝反动统治日益丧尽人心之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直隶日渐活跃发展起来。首发直隶革命之先声的是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的学生吴越。吴越早于1903年便联络南方革命志士杨守仁，赵声等人在保定密组“军救国教育会”，次年又组“北方暗杀团”，并著有《暗杀时代》一书，主张以恐怖暗杀手段为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之前声。1905年初他在保定创办《直隶白话报》，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启迪民智，宣传爱国。是年7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并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吴越认为这是“欲断送汉族无自立之一日，而为满族谋于孙帝王万世之业也”，遂以暗杀手段阻其“立宪骗局”的实现。因行刺时炸弹提前爆炸，谋刺未遂，吴越也以身殉难。这次事件举国为之震动，孙中山先生曾评论此事“影响国内外人心者至大”。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益发展，直隶以其地位的重要性引起革命党人的关注，一些南方革命党人秘密潜入京畿活动，以期实行“中央革命”，从根本上动摇清廷统治。而留日学生陆续归国，更对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05年中国同盟会总部在东京成立，直隶籍留日学生有35人加入，并成立直隶支部，派人回国指导推动革命。1906年直隶蠡县人陈幼云从日本弘文书院毕业，受同盟会派遣回到保定，建立了直隶第一个革命党人的组织同盟会河北支部。以此为开端，直隶革命汇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流。1908年和1909年，革命党人廖仲凯曾两次奉孙中山之命，北上华北第一大商埠天津，进行秘密活动，对北方革命起了推动作用。

在武昌起义前，直隶相继建立起一些革命组织，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保定同盟会河北支部成立后，秘密输入《民报》、《革命军》、《天讨》等革命书报，除在学界培养革命青年，发展同盟会员外，还吸收保定各军事学堂学员多人入盟，这些人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对瓦解清军策动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以保定学生为主体的同盟会外围组织实行会、共和会相继成立，1909年两会合并，是为保定共和会。该会主要负责人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学生胡鄂公，其宗旨为：“推翻满清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融合种族界限，发展全国实业。”共和会颇具规模，会员多达3000余人，并在京、津等地设有分会。共和会曾发起“断发”学潮，京津保学生起而响应，剪去标志清朝统治的发辫竟成为一时的风尚。以后该会又发动京津保学生共同罢课，积极参加保路保矿和国会请愿活动，扩大了革命影响和声势。在天津，成立了同盟会外围组织克复会，并发行《克复报》，以排满复汉，唤起民众反清救国意识为主旨。除去上述革命组织外，尚有直隶第一个反清武装团体——丁开嶂的铁血会。1904年，丁开嶂愤于日俄战争竟然在中国领土上开火，遂广结绿林豪杰，成立抗俄铁血会，在东北袭扰俄军，日俄战后转而反清。1906年丁开嶂加入同

盟会，在其家乡直隶丰润成立北振武社，以为北方革命党人秘密往来集会的场所。铁血会亦更名为“革命铁血会”，并在北京周围及关外广泛发展力量，在北方颇具声威。

此外，革命党人的势力亦渗入北洋新军中，驻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即为同盟会会员，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中也有革命党人的活动。另有一些同盟会员分散在天津、张家口、通州、石家庄等地，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反清斗争。如顺直咨议局议员孙洪伊、王法勤等即为同盟会员，并以合法身份领导立宪及国会请愿运动。

直隶革命党人的活动及革命组织的建立，将革命火种散播到直隶各地。虽然与南方各省相比，直隶革命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但却酝酿了日后辛亥革命的风暴。直隶各阶层人民接连而起的反抗斗争，预示了清朝统治末日即将来临。武昌起义前夜的直隶，对于清王朝来说已不再是安静的后院，而是危机四伏之地，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束，已是为期不久。

（二）响应武昌起义，北洋新军首先发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或起义，革命烈火很快燃遍大半个中国。在历史激烈变革浪潮冲击下，直隶政局一片混乱，统治者惊慌失措，一些官吏纷纷携眷出逃或避入租界，大有惶惶不可终日之势。直隶人民和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极为振奋，分外活跃，各种革命团体应运而生，天津共和会、急进会、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连同原来的直隶革命团体，多达十几个。为了响应武昌起义策动直隶革命，革命党人公开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奔走于京、津、保及滦州、张家口等地，或是发动地方民团武装，或是潜入北洋新军，积极筹备武装起义。10月16日，俄国驻天津领事向其上司密报说：“假使革命党人在此起义，天津立刻会到他们手里，因为居民完全站

在他们那一方面。”这说明了当时革命空气的高涨和人心的向背。

直隶革命这时虽呈高潮之势，但由于武昌起义事出突然，革命党人无论在组织上思想上尚无充分准备，缺乏统一领导和联系，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对此，直隶革命党人也有清楚的认识。受东京同盟会总部派遣回国的王葆真，在武昌起义后，以“直隶省革命力量最薄弱最困难，而关系革命成败最重要”，赶至直隶滦州，策动北洋新军起义。天津共和会会长白雅雨毅然表示：“拿破仑说过，英雄字典里没有‘难’字，北方革命的职责难道要别人来承担吗？”他抛妻舍子，不畏艰险，积极筹划武装起义。在革命党人努力推动下，直隶响应武昌革命的斗争，以北洋新军的滦州兵谏拉开了帷幕。

武昌起义爆发后，直隶率先举起反叛大旗的是号称清军精锐、清王朝的统治支柱北洋新军。10月27日，驻滦州的北洋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北方新军将领蓝天蔚、卢永祥、伍祥桢等人，发动了震动全国的滦州兵谏，以武力逼迫清廷实行立宪，并坚决抗拒清廷南下镇压革命军的调遣。

滦州兵谏的发生不是偶然的。1911年春，当清廷决定于10月举行3年一次的秋操时，奉调参加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十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即有“私带子弹，相机起义”之密谋。张、吴、蓝3人不仅在北洋新军中有“士官三杰”之称，而且均为同盟会秘密会员。武昌起义爆发后，秋操取消，清廷急忙抽调各部组成大军南下镇压革命。张绍曾闻知第二十镇被调往前线后，即将所部屯于滦州，急返奉天，与蓝天蔚及第三镇统制卢永祥、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桢等商量对策。张绍曾明确表示：“武昌之变，为除专制，主共和，以此倡义号召天下，凡属同胞谅皆赞助。今吾辈所统各部队，半属北人，虽未预约同谋，应皆晓以斯义，偶冒然而往，胜则自残同类，负亦死无指名。”这时该镇革命官兵王金铭、施从云等力主乘清军南下京师空虚之际，直捣清廷巢穴。但鉴于北洋新军中反革命力量还很强大，

张绍曾在与蓝、卢等人商量后，决定采取“先向清室陈述国事意见，如不采纳，再行发动”的权宜之计，并拟就立宪政纲12条，要求清廷废除皇族内阁，召开国会，赦免国事犯等。10月27日，他回到滦州，即命所部“均不前进”，同时派专人将立宪政纲送至北京，上奏清廷，并通电全国。震撼全国的滦州兵谏就此发生。此一期间，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武汉前线吃紧，清廷一日数电促其拔队南下，但张绍曾抗旨不遵，待机而动。

滦州兵谏发生后，立刻受到直隶及全国各方面的支持与关注。京津革命党人陈之骥、王葆真曾两三次前往滦州，敦促张速举义旗，直捣京师；东北革命党人亦派商震、李德瑚等人前往策动游说，促其宣布独立，并推举张为“东三省督府都督”。各地函电也如雪片纷至，力劝其“扫除满清，光复汉室，组织共和，建立民国”。顺直咨议局还专门召开50多人的会议，推王法勤、孙洪伊为代表赴滦州见张绍曾，表示“第二十镇如宣布起义，经过天津组织政府，顺直咨议局完全担任筹拨军饷，按时供应”。为了扫除滦军举义直捣京津途中的障碍，王葆真积极向天津外国领事团疏通，滦军如果进入天津，不以违背1902年撤销天津都统衙门时所订天津20里内不得驻有清军的条款对待。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张绍曾举事的条件很快成熟。

张绍曾在离京城近在咫尺的滦州拥兵抗命发动兵谏，不啻是给正在忙于镇压南方革命军的清廷火上浇油，清廷大为震惊，满朝亲贵大臣大哗，极为恐慌。他们经过紧张的计议，决定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前去“抚慰”，以伪称同意“立宪”，稳住张绍曾，以安定起火的后院。

重兵在握的吴禄贞是北方革命党人希望所在，武昌起义后，京津革命党人即力促其尽快起事，以倾清廷于指顾间。吴虽早有此意，但因第六镇革命力量薄弱，实感孤掌难鸣，此次受命前往滦州给了他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于10月29日抵达滦州后，立即与张绍曾密谋组织“立宪军”，以要求入卫京师为名，吴禄贞、张绍曾、蓝天

蔚分由保定、滦州率军入京，打出“维护清室，革新政治”的旗号，控制中央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密议甫定，传来山西新军于同日起义宣布独立的消息。吴、张极感鼓舞，议决“联晋覆清”的方略。吴禄贞立即给阎锡山写信提出“共组燕晋联军”，派人火速送往山西。同时重新议定，吴禄贞速去石家庄与阎锡山商谈共组燕晋联军，张绍曾仍以立宪军的名义调蓝天蔚等部来滦集结，双方准备好后，同时宣布独立，进攻北京。而后，吴离滦赴京，向清廷报告张绍曾“并无异志”，要求亲赴石家庄“防剿”。31日，吴抵石家庄。

清廷此时应付南方革命军已尚属十分吃力，又在近畿面临京东有张绍曾以武力要挟，京西有山西革命军的进逼，不得已同意滦州兵谏政纲，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继而宣布解散皇族内阁，拟具宪法重大信条19条，任袁世凯为总理内阁大臣等。同时又连电张绍曾，谓之已同意立宪，令其迅速开赴前线。但张绍曾不为所动，按照既定计划向清廷要求“入卫京师”，并电约蓝天蔚、卢永祥来滦。11月1日，他又扣留了清廷从东北运往武汉的军火，并分电致武汉革命军政府，表示支持革命，揭露清廷“假行立宪”，“拥护专制”，指责清廷拟具的重大信条19条与原奏不符，袁世凯不是国会公选等。清廷对张绍曾的言行极为恼火，遂对第二十镇官兵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加强防备等手段，逼迫张绍曾从速开拔，放运军火，但均遭到张绍曾的拒绝。张绍曾仍继续积极准备进攻北京的部署。

与此同时，吴禄贞在石家庄组织燕晋联军取得顺利进展。吴于10月31日抵达石家庄后，即命已进发到井陘的所部第十二协统领吴鸿昌停止前进，向清廷发电假称自己亲赴井陘“督师进剿”等军情，并派人入晋，与山西革命军取得联系。这时清廷已得密报，知其与张绍曾、蓝天蔚、阎锡山欲图起事之密谋，为稳住局势，布置对策，于11月3日任吴为山西巡抚，“令其迅速接任”，“以解除京汉中段威胁”，企图将吴调离石家庄，分化瓦解革命

力量。11月4日，吴禄贞赴娘子关，会晤了阎锡山等人，明确地表示自己不仅决无做山西巡抚之意，而且愿与“晋军携手，共成推翻清朝之义举”。吴、阎遂商定组成燕晋联军，吴禄贞被推举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分别为副都督兼副司令，并决定于11月7日，吴、阎、张同时分路起兵，会攻北京，一举推翻清朝。

吴禄贞返回石家庄后，即加紧进攻北京的部署，他先下令扣留了清廷运往武汉前线的军械辎重，而后又公开电奏清廷，弹劾在前线指挥清军与革命军作战的荫昌“督师无状，纵肆杀戮”，应“严行治罪”；又以袁世凯为革命之劲敌，派人前往武昌与革命军联系，欲南北夹攻，阻袁世凯北上进京，并置其于死地。同时电告张绍曾：“联晋共图大举，希协同动作，以践前约”。张绍曾接电后即命滦军准备出发，电约蓝天蔚“协同前进”，并给吴回电告之：“我军整装待发，请即与山西起义军前来会师。”11月6日晚，吴禄贞拟好了给张的电报：“愿率燕晋子弟一万八千人以从。”其时，山西革命军两营也抵石家庄，吴、张、阎联合夹攻北京，颠覆清室的时机已经成熟，革命大功告成即在眼前。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形势陡然逆转。吴禄贞扼住正太京汉铁路咽喉，西联晋军，东结滦军，欲阻袁世凯北上，夹攻北京，同时吴、张截军械、扣军火，南呼北应，对清廷形成致命的威胁。在这肘腋之变迭生的情况之下，清廷和袁世凯为扑灭京畿即将燃起的革命烈火，策划了镇压北洋新军义举的阴谋，并在关键时刻举起了屠刀。他们派人以重金收买了吴的卫队长兼骑兵营长马惠田，于11月7日凌晨将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暗杀于石家庄；同日又解除了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的兵权，令其“回津养病”。吴的被害，张的去职，立使即将起义的北洋新军群龙无首，燕晋联军随即解体，会攻京师的计划亦付之东流。由滦州兵谏引发的北洋新军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至此便告失败。

滦州兵谏和燕晋联军的失败，给历史留下了令人扼腕叹息的

一章。吴禄贞及张绍曾作为清军的高级将领，虽身为革命党人，但与清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清廷抱有一定幻想，对其阴险狡诈缺乏认识和警惕，以至在整个密谋过程中事机连连泄漏，直接遭到清廷的破坏和镇压。此外，吴禄贞虽为第六镇统制，但由于任职时间短（1910年接任），未能真正掌握该镇兵权，而革命势力也未能在该镇植根，以至在紧要关头被自己的卫队长所害，使即将到手的胜利功亏一篑。张绍曾虽有京津关外革命党人及本镇革命官兵的支持，但在吴被刺后即陷于软弱动摇，丧失了信心，坐失了革命良机。

滦州兵谏及燕晋联军尽管失败了，但它是发生在全国革命高潮中清朝统治心脏地区的革命斗争，对处于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的清王朝是沉重的打击，牵制和打乱了清廷对于革命的镇压和部署，有力地支援了武昌革命，对辛亥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滦州兵谏对北方乃至全国政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张绍曾发动滦州兵谏，才有了吴禄贞燕晋联军夹攻北京之密谋的制订，如果燕晋联军成功，那么清朝的倾复便是指顾之间的事，辛亥革命将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局。由于吴的被刺，北洋新军会攻北京计划的失败，乃使袁世凯得以顺利入主中枢，以致演成日后南北和议、清廷退位、袁世凯任民国总统的结果。

滦州兵谏及燕晋联军的失败，也使直隶一度高涨的革命形势骤然低落，革命党人在“北洋之兵力，顿失重心”，保定革命党人原计划配合吴禄贞同时起事，发动各县举行暴动宣布独立，在吴被刺后以力量薄弱，采取了“力持慎重”的态度。虽然后来仍有为阻湖广总督段祺瑞南下，炸新乡黄河铁桥和唐河铁桥之举，但亦未获成功。不少革命党人分投京、津、张家口、包头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山西革命军亦放弃了直捣京师的计划，退回娘子关内。革命情绪最强烈的第二十镇官兵，亦因张绍曾去职受到极大挫折。

11月下旬，革命党人在张家口的举义又遭夭折。张家口举义

酝酿于武昌起义之初，保定革命党人南琴轩、张雨岑等人以张家口位于京畿，是北方之重镇，对推动北方革命极为重要，乃与当地革命党人、铁血会成员李飞仙、秦宗周等建立联系。山西独立后，为配合山西起义军续西峰“出平型关，直捣北京”的计划，11月2日，他们成立张家口起义司令部，并派人到天津与革命党人王葆真、白雅雨会晤，商洽购买军火之事，得到大力支持。白雅雨亲将第一批军火运至张家口。11月27日，第二批军火由高志清等人前往运回，不幸在返回张家口的途中被清廷密探发觉，高等人被捕，张家口起义司令部遭到破获，李飞仙、秦宗周等10余人被捕，李、秦等7人英勇就义。张家口起义未举便遭失败。

直隶革命力量的薄弱，反动力量的疯狂，使革命党人深感北方革命的不易，迫切需要支持和帮助。在吴禄贞被害以后，京津革命党人即派人到湖北军政府请援，得到革命军政府的极大重视，认为北方革命“目前实有迫切需要”，即派代表胡鄂公、冷公剑等人携款北上天津，与直隶革命党人及各革命团体取得联系，协助北方革命的开展。在南方革命力量的支持和推动下，直隶的革命斗争从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反对南北议和，坚持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仅一个多月，革命烈火迅速蔓延，全国大部份省份宣布独立，清王朝陷入穷途末路之中。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在12月初先后与袁世凯达成了南北停战协定，进行了南北和谈，使得武昌起义后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渐趋于低落，中国政局呈错综复杂的局面。但是直隶革命却于此时异军突起，形成局部的高潮，对辛亥革命后期的进程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从吴禄贞被刺以后，善于投机的政治野心家袁世凯得以顺利入主中枢，就任了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他立即开始了谋取更

高权力的活动。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稳定北方大局，以与清廷和南方革命党人讨价还价，袁世凯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一方面伪装同情革命赞成共和，一方面加紧对京畿及北方革命的破坏与镇压。直隶总督陈夔龙秉承其旨意，加紧对革命的防范，“党人有煽动滋事者，一经侦察属实，拿获到案，严惩不贷”，北方形势更加险恶。继张家口举义失败，李飞仙等人被杀害后，11月29日北京革命党人陈雄、高新华、李汉杰的起义亦遭镇压，陈、高、李等多人殉难。12月2日，革命党人、戏剧家王钟声在天津密谋起义事泄被捕，于次日被直隶当局按“行营拿获奸细论罪”处以死刑。在这种情况下，直隶革命党人为加快革命步伐，加强领导，统一各不统属的各革命团体，结束各行其是的状况，于12月1日及12月14日在天津相继成立了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和北方革命协会。

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以汪精卫和李石曾为正副支部长，曾发行《民意报》，鼓吹“中央革命”和“实现共和”。北方同盟会员初时以汪、李之革命声望，纷纷加入之。但是汪精卫此时与袁世凯相互利用，汪以“北方事不易为”，不主张发动武装起义，而以“联袁倒清”为主要手段和目的，不遗余力地为南北和议而奔走。汪的作为，遭到多数革命党人的反对，决定另组新的机构领导北方革命。12月14日，在胡鄂公的主持下，北方革命协会成立，将直隶分散的10余个大小革命团体联合起来，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为宗旨，坚决反对南北和议，坚持动摇清廷和袁世凯之根本彻底推翻清王朝的暴力革命。此前11月底至12月初，胡鄂公已与直隶革命党人策划了在京、津、保、滦、通等地发动起义的部署，并在各地分设起义总指挥部，确定了各部的人选。北方革命协会的成立，各革命团体的大联合，有力地促进了直隶武装起义的开展，将直隶革命推向了高潮。

12月18日，在北方革命协会成立后的第四天，任丘、雄县起